

中日文化交涉史的初步觀察

余 英 時*

我十分感謝關西大學給予我這樣高的榮耀，頒賜名譽博士學位。我也同樣感謝國際聞名的澀澤財團捐助這個講座，使我有機會在“東亞文化交涉學研究中心”成立儀式的大會上作一次報告。

今天我有幸接受關西大學給我的榮譽，心中特別感覺親切，因為從河田校長算起，我在日本學術界的朋友以關西大學為最多。由於年齡的關係，我和內人陳淑平近年來已很少作海外旅行，但這次重訪大阪，我們都是很高興的。

首先我要鄭重祝賀“東亞文化交涉學研究中心”的創建。以關西大學在這一領域所積累的巨大業績，這個新“中心”必將開闢疆土，更上層樓，是可以預卜的。

我本來對於“東亞文化交涉學”的確切涵義不很瞭解。感謝陶德民教授為我提供了一篇《文化交涉學的意義》，我才知道關西大學的朋友們正在發展一門新的學術領域。《文化交涉學的意義》說，“文化交涉學”具體來說是要超越國家和民族等分析單位，設定一個具有一定關聯性的文化複合體，在關注其內部的文化生成、傳播、接觸與變貌的同時，以多角度的和綜合性的觀點來解析整體的文化交涉的樣態。為此，需要做到在兩個方面的“越境”，一個是超越以往人文科學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框架，另一個是超越國家民族性的研究框架。

這是一個很合理並富有啓示性的構想，但同時也直接涉及文化或文明研究的取向問題。我想借此機會將“文化交涉學”放在關於文明的一般思潮中，試作一點定位的考察。這是因為“文化交涉”既是一個獨立自主的(autonomous)“學術領域”，它必然具有普世性，不僅限於東亞地區。

1996年Huntington發表專書(《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》)，全面討論了今天世界上幾個主要文明，及其互相衝突的可能性。他參考了現代史學家、哲學家、社會學家、人類學家的各種說法，一共列舉了七大文明：一、中國(Sinic)；二、日本；三、印度(Hindu)；四、伊斯蘭(Islamic)；五、西方；六、拉丁美洲(Latin American)和七、非洲(African)。為了顯示他已放棄了西方中心論的立場，他從東方數起，因此中國和日本在這張“文明”的名單中佔據了第一、第二的位置。

不過，稍稍檢查一下他的立論依據，我們便立即發現，Arnold J. Toynbee(1889-1975)的研究成果為他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。無論就概念或資料說都是如此。由於Toynbee在日本曾發生過相當重要的影響，讓我概括一下他在“文化交涉學”方面的特殊貢獻。

* プリンストン大学名誉教授

《歷史研究》是一部關於人類歷史上一切文明興衰的比較研究，一共列舉了二十一（或二十三）個文明，有的延續不斷，有的則中斷夭折。從“文化交涉學”的特殊角度出發，我在這裏想指出此書的三個重要論點：

第一、他有意識地脫出了西方文化中心論的陷阱，用一種平等的眼光看待歷史上一切出現過的文明。西方文明雖然在一、二百年中主宰了世界，但它的內在限制已清楚地顯現了出來，不可能單獨引導人類走出目前的困境，西方基督教文明和科技文明必須與其他文明（包括東亞儒教文明、日本文明、印度文明、伊斯蘭文明等）進行深度對話，共同尋求新的出路。他也看到不同文明在互相交涉中發生過衝突，然而他更強調文明與文明之間融合的可能性。在這一點上，與Huntington相對照，他的觀點不但更為全面，而且也更為積極。

第二、Toynbee是第一個正式提出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（unit）應該是“文明”，而不是民族國家（nation or national state），也不是時代（period）的史學家。文明，特別是世界上幾個主要的文明，如西方、遠東、印度、阿拉伯等，不但傳佈的領域十分廣大，不受少數或單一民族與國家的局限，而且源遠流長，也不能限於某一時代。因此他認為只有以文明為物件，歷史研究才能窮盡人類發展的真相。

第三、史學本是一種綜合性的學術，舉凡人文社會科學各部門的方法和研究業績都可以為史學家所借用。Toynbee把史學界定為“文明”的研究，其範圍比傳統的史學更是廣闊的多了。所以從方法論的角度說，《歷史研究》基本上體現了跨學科的綜合精神。在Toynbee的構想中，“文明”作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必須看作是一包羅萬象的整體，不是任何一個專門學科（discipline）所能單獨處理的。因此在《再思錄》中他一方面強調諸科並進的多元取向，另一方面又主張打破種種即成的學科壁壘以取得貫通的理解。

從以上的概括可以看出，上引《文化交涉學的意義》一文中關於“在兩個方面‘跨越’”的研究方式在Toynbee《歷史研究》的巨著中已獲得非常充分的展開。他的特殊歷史理論在最近二、三十年中已少有人注意，但是他所開創的文明研究今天卻成爲一個有活力的新學術領域。“後冷戰”時期的國際狀態——Huntington所揭示的“文明衝突”——迫使我們不能不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各大文明之間的交涉上面。Toynbee無疑是“文化交涉學”的一位重要的先驅。

現在我要從一般的文化交涉學轉入東亞地區，特別集中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文化交涉方面，因爲這是關西大學一向貢獻最爲卓越的研究領域。我清楚地記得，1994年春季我在關西大學訪問期間，曾有幸向大庭修先生請益，他贈給我幾種有關中日交往的原始資料，主要是明清時期中國商船到長崎的詳細記載，其中不但包涵著大量的貿易史料，也偶有關於中國士人和書籍附船而來的事蹟。關西大學這些出版物當時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使我親切地認識到，日本所保存的關於中日文化交涉的原始資料極爲豐富，尙有待於專家去作深入而有系統的探究。

我早年寫《漢代的貿易與擴張》（英文，1967）時曾接觸過早期日本（倭國）與中國的貿易來往。但早期的文字記載和考古資料都極爲簡略，所知有限。漢魏以後的中日交涉史我完全沒有研究過，因此不具備發言的資格。下面我只想討論一個高度概括性但卻十分重要的問題，並陳述

我的初步看法，請大家指教。

我的基本問題是：在“東亞文化”（或“文明”）這一整體概念之下，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關係究竟應該如何理解？這個問題也可以說是 Toynbee 最先提出來的。在論及東亞文明時，他劃分了兩個歷史階段，分別稱之為“中國古代文明”（他的專門名詞是“sinic civilization”）和“遠東文明”（“far eastern civilization”）。“中國古代文明”上起商、周，下迄漢代滅亡；“遠東文明”則繼起於六世紀，即中國隋、唐時期。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把“遠東文明”（相當於“東亞文化”）分作兩支，一為“本幹”（“main body”）在中國，一為“分支”（branch），則在日本。他雖然認為日本沒有創造出一個“獨立的文明”（independent civilization），但“遠東文明”既有兩支，則他已肯定日本這一“遠東分支”具有相對的獨立性，不能包括在中國的“遠東主幹”之內。他的看法在 Huntington 手中又獲得進一步的修正。Huntington 放棄了“遠東文明”的整體概念，而把日本看作與中國截然不同的一另一種文明（a distinct civilization），不過他仍然承認，日本文明是從中國古代文明（sinic）中發展出來的。

Toynbee 和 Huntington 都沒有深入研究過中日文化交流史，他們的觀察自然只能從大體上著眼；然而旁觀者清，視野反而比局中人更為廣闊。讓我試從一般的歷史事實上作進一步的澄清。

首先我要指出，日本無論是作為一個文明、社會或國家，歷史上基本不在朝貢系統之內。我遍檢隋至清的正史，可以斷定中日兩國的往來主要限於文化與經濟方面的交流。

其次，我要談一談中國文化對日本影響的問題。中國文化起步在前，日本深受影響，這是無可懷疑的。日本接觸中國文化，包括文字、儒教經典、佛法等，最先似乎是間接的，即通過朝鮮半島，特別是百濟。隋、唐以後，日本開始了一系列全面吸收中國文明的運動，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。總之，從隋唐至德川時代，日本先後幾乎引進了中國文化的每一方面，影響之大之久，自不必說。然而我們卻決不能誤認日本文化的整體是從中國移植過去的。事實上，日本在大量引進中國文化的個別成分之後，卻根據社會內在需要另作組織與安排，其結果則是自成一格的日本文明——a distinct civilization。日本的語言文字便提供了一個最具象徵性的實例。向來有所謂中、日“同文”說，這完全是一個誤會。日本借用了大量的漢字，然而卻納進了自己的文化和語法結構之內，而且構成了一個獨特的語文系統，與漢藏語系根本不能混為一談。從語文推到思想、宗教、藝術、社會組織等其他方面，也無不如此。最近我讀了已故 Marius B. Jansen 先生的《China in the Tokuganwa World》，更加深了我的印象。德川時代是中國文化對日本發生影響的最高峰，但日本人自覺為一民族、國家的實體（national entity）也正是在德川時代充分展開的。德川儒學家和國學家表面上持論相反，但深一層看，卻殊途同歸，即同在肯定日本為東亞文明的主體；這和當時關於 national entity（民族、國家實體）的自覺是互為表裏的。儒學派的“聖人之道”是一種脫離了歷史的想像，與真實的中國已無任何關聯，他們不過把這四個字懸為日本文明的理想境界而已。國學派則否定中國文明對日本文明的影響，更直接地表達了一種新起的民族自覺的情緒。

英國的 George Samson 曾對日本文明提出過一個觀察：日本人雖然在表面上大量向外面“借

用”（“borrowing”）許多東西，但卻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“內在文化堡壘”（“inner cultural citadel”）。這一觀察，如果不作極端化的理解，一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。在十八世紀以前，日本“借用”了無數中國文化的個別成分，但主要是獲取了各種成分的建構材料，最後所造成的則是別具一格的日本文化。所謂“內在文化堡壘”便是在這一長期“借用”與建造的歷史過程中逐步形成，至德川時代而達到充分自覺的階段。我們可以肯定地說，“借用”本身正是日本文化精神的一種獨特表現。1876年森有禮和李鴻章的對話便清楚地表達了這個意思。

最後，我願意就明治維新以後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涉稍說幾句話，以結束這篇講詞。

前面已說過，從隋、唐至明、清的一千年間，日本通過海上貿易和宗教、文化的接觸，逐步深入地認識中國。所以到了德川末期（十九世紀），日本官方和民間已掌握了相當完整的關於中國的知識。他們和中國的公私交涉大體都保存在文學記錄之中。相反的，清中葉以前，中國人對日本則缺乏系統的知識，而且無論朝野也都沒有表現出求知的興趣。這大概是由於日本既不在朝貢體系之內，朝廷和士大夫都不免忽視它的存在。

我為什麼要作這個鮮明的對照呢？這是為了說明：十八世紀以前的“天朝”心態使中國完全看不到東亞的另一支文明已悄悄發展到成熟的階段，很快便要領先了。從這個角度上看，1793年乾隆答英王George III書是最富於象徵意義的，因為它是中國“天朝”心態的最後一次公開表現。五十年後（1842）中、英簽訂《江寧條約》，施行了兩千年的朝貢體系便趨於死亡了。東亞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，文明的動力也從中國轉入日本。

面臨著西方的挑戰，日本立即把它的“借用”精神從中國移向西方。德川幕府早在1855年便開始自造西式輪船，1865年日本更是直接求助於法國，建造了第一所現代船廠。明治維新以後，日本展開了一個全面“借用”西方現代文明的歷史階段。從政治體制、教育系統、到服飾都在有計劃地學習西方。西化派如福澤諭吉“脫亞入歐”的口號曾震動一時，但在實際演變過程中日本卻並未喪失它的“內在文化堡壘”。像過去對於中國文化一樣，日本再一次運用外來的材料建構了一個新的東亞文明。前引Toynbee和Huntington的論斷不是沒有依據的。

在清朝的最後五十年中，日本已明顯地掌握了東亞文化的主流。中國士大夫也開始對日本另眼相看，最後不得不承認日本已找到了應付西方侵略的成功模式。“師法日本”的意識在他們的心中逐漸滋長，至甲午（1894）戰爭以後，則全面顯露出來了。下面讓我選三個例子來說明這一論點。

第一、全面以日為師的意識集中表現在戊戌（1898）變法這件大事上面，由康有為正式呼喚了出來，光緒完全為他的《日本變政考》所說服。1898年秋天伊藤博文訪北京，光緒特予召見。在談話中光緒不但對伊藤在明治維新中的貢獻頌揚備至，而且鄭重托他向親王、大臣等詳說維新的過程和方法，並提出積極的建議。

第二、張之洞在《勸學篇》（1898）中說：“西學甚繁，凡西學不切要者，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”。張氏以提出“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”著稱，但這句話明確顯示：他心中的“西學”其實是經過日本人“刪節而酌改”的“西學”。確實，在“五四”新文化運動以前，中國知識人所吸收

的“西學”主要都是從日本轉手而得來的，其後來在中國的影響之大是難以估計的，可以說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涉史上極為重要的一章。

第三、在企業經營和管理方面，日本也在中國發生了示範作用。最著名的例子是張謇（1853—1926）在甲午戰敗後棄儒就賈，決心走工業救國的道路。他1903年訪日，在日記中對日本的政府體制與工業經營方法稱讚備至。

以上從政治、學術思想、企業等三個主要領域各舉一例，我想已經足夠說明：由於“借用”西方的成功，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已取得東亞文明的主導地位，迫使過去以“天朝”自居的中國轉而處於求教的位置。

總結地說，以明治維新為分水線，中、日文化交流史可以清楚地劃為兩個時期：在此之前，日本長期“借用”中國的文化資源，建構了自己的獨特文明。而中國則對日本缺乏深刻的認識，因為日本不在朝貢系統之內。明治以後，情況恰好顛倒了。中國從“天朝”的幻覺中逐漸清醒了過來，開始看清日本文明在應付西方侵略上的成功。但這時日本的文化“借用”精神卻已從中國轉向西方，不少政治和文化精英（elites）對於中國也不免滋生了一種“後來居上”的優越感。在“富國強兵”的要求下，日本把西方現代武力擴張的精神也成功地“借用”了過來，中國則成為其擴張的對象。中日之間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中無法展開正常的文化交流。中國在清末民初雖有參照日本模式進行現代轉化的嘗試，最後也完全落了空。

文化交流與Toynbee所強調的文明對話互為表裏，這正是文化交涉學的研究對象。文明對話並不等於少數代言人之間的對話，因為這樣的代言人嚴格地說是不存在的。相反地，它是指文明與文明之間，通過種種管道進行雙向的溝通，其領域可以從貿易一直延伸到宗教。Toynbee認為這是增進互相瞭解，消除衝突的最有效的方式。他是最早擺脫西方中論者之一人，所以1950和60年代在日本全力推動東西文明的對話。今天西方中心論已全面退潮，全球化（globalization）的大趨向建立在多元文明並存的基礎之上，已取得世界的共識。文明對話也必須隨著多元化，不再限於其他文明與西方之間。不同的非西方文明之間的對話同樣是重要的。過去一個多世紀中，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，都把對話的重點放在西方，而中、日之間的文明對話反而受到了冷淡。關西大學“東亞文化交涉學研究中心”恰好在這一關鍵時刻應運而起，填補了一片重要的學術空白。這真是孟子所謂“天降大任”，讓我借此機會預祝它的成功。